

Yin Jiazheng's Cave: the Family Cave Art and the Illustrious
Family Belief in Tubo Period at Dunhuang

陰嘉政窟

敦煌吐蕃时期的家窟艺术与望族信仰

王中旭 著

民族出版社



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XJA780003) 成果

陰嘉政窑

王中旭◎著

敦煌吐蕃时期的
家窟艺术与望族信仰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嘉政窟:敦煌吐蕃时期的家窟艺术与望族信仰/
王中旭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5
ISBN 978-7-105-13201-0

I. ①阴… II. ①王… III. ①敦煌壁画—研究
IV. ①K87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6449 号

责任编辑:王欣

封面设计:李源恒 孟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429千字

印张:15.625

定价:42.00元

ISBN 978-7-105-13201-0/K·2321(汉128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王中旭 湖北荆门人。200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获博士学位。曾获2008年度敦煌奖学金一等奖。自2009年8月起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要从事中国宗教美术方面的研究。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敦煌佛爷庙湾墓伯牙弹琴画像之渊源与含义》（2008年）、《吐蕃时期敦煌〈五台山化现图〉与五台山信仰》（2009年）、《敦煌翟通窟〈维摩变〉之贞观新样研究》（2012年）、《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的图本样式研究》（2013年）等。

说 明

1. 本书所有洞窟名或窟号，凡未说明其所属石窟者，均指莫高窟，如阴嘉政窟，指莫高窟阴嘉政窟；第 159 窟，指莫高窟第 159 窟。

2. 本书所指窟型大小如下：大型窟，即大像窟，包括北大像和南大像；中大型窟，以第 365 窟为标准，主室高 4.80、深 7.03、宽 13.20 米，包括第 158 窟等；中型窟，以第 231 窟（阴嘉政窟）为标准，主室高 4.56、深 6.39、宽 6.79 米；中小型窟，以第 159 窟为标准，主室高 3.46、深 4.66、宽 5.10 米；主室小于中小型窟的为小型窟。

3. 本书中的“吐蕃时期”，是指吐蕃占领沙州的时期，约 786—848 年。本书根据敦煌文献中（含洞窟题记）记载的敦煌佛寺、洞窟的营建情况，将吐蕃时期莫高窟的营建分为早、中、晚三期。吐蕃早期约为 786—814 年，为营建活动的停滞期；吐蕃中期约为 815—831 年，为营建活动的恢复期；吐蕃晚期约为 832—848 年，为洞窟营建的活跃期。

4. 本书莫高窟所有洞窟的尺寸，皆依据张大千、谢稚柳测量的数据转换。张、谢测量数据参见张大千著《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谢稚柳著《敦煌艺术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在本书所引敦煌文献中，“S.”表示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汉文文献斯坦因（Stein）编号；“P.”表示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

汉文文献伯希和 (Pelliont) 编号; “P. T. ” 表示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伯希和 (Pelliont) 编号; “国图” 表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Ch. ” 表示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卷纸画编号; “Дх. ” 表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

6. 本书所引敦煌文献的编号, 其中有“背”字者, 表示所引文献在该文献背面; 其中有括号且括号内有数字者, 该数字表示所引文献为这一组文献的第几篇。

7. 本书所引文献, 若底本缺字或无法辨识, 用□表示缺一字, 用□□表示缺多字; 若底本有错字, 在其后用 () 注出正字; 凡文字无法辨识据文意补者, 在□或□□后的 () 内注出补字, 所补字不确定者加“?”; 凡脱字之处, 用 [] 注出脱字; 凡多字者, 根据文意用 [] 注明多出的文字。

8. 附录一《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依据 P. 4638 (3)、P. 4640 (1) 直接校对出正确版本, P. 4638 (3) 有误并依据 P. 4640 (1) 改正者, 在注释中标出; 两本皆有误者, 依据 P. 4638 (3) 标出错误文字, 然后改正。

序

以敦煌石窟艺术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宗教美术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中，王中旭是第一个。我支持他研究敦煌，原有两点考虑。其一，中央美术学院曾是最早投入敦煌艺术研究的高校之一，董希文、吴作人等著名画家，王逊、金维诺等著名美术史家都曾致力于敦煌，为敦煌艺术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学术成果一直受到海内外敦煌学界的重视。但最近二十年来，美术研究更多地关心当代艺术热点问题，渐渐疏离了敦煌学这个国际学术热点区域。这不仅失去了艺术史在敦煌学领域的对话能力，而且意味着放下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其二，近年来，由于较频繁地接受来自欧美的学术理念，艺术史的研究更趋于文化观察和外围研究，本体的问题有些受冷遇。研究艺术史原就需要有坚守的精神。对于本体的研究，前辈学者打好了基础，而要开拓局面，仍需有新生力量来接续。基于这两点考虑，回到敦煌，回到本体就成为宗教美术研究今后的两个目标。

中旭能走进敦煌，另有一个机缘。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申报的教育部攻关项目《敦煌吐蕃时期石窟艺术研究》开始启动，郑炳林教授推荐我来主持这个项目，中旭作为我的助手参与了进来。这个机会自然难得，但研究难度又极大。在此之前，中旭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虽曾参观过敦煌，对敦煌学有过一些了解，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并没有具体的想法，这次有了接触课题的机会，但从事这个课题研究也有相当的

压力。

吐蕃占领敦煌前后达六十余年，这段特殊的历史对于敦煌石窟的营建到底起了怎样的影响？留下了多少遗迹？在石窟艺术中保留了多少传统，又作了多少改变？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学界一直在进行研究。石窟考古调查、汉藏文书的整理、吐蕃洞窟的分期排年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成果为吐蕃时期的石窟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同时也要求艺术史研究能提出自己的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有疑惑，就有了走近了看的冲动；因为有压力，就有了面对的精神动力。走进敦煌，无论对谁都是绝好的学习机会。

依中旭的学力，初识敦煌，选择阴嘉政窟做个案研究是十分明智的。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阴嘉政窟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该窟保存基本完好，洞窟类型、图像分布、艺术风格等原始信息保留较充分；其次，敦煌藏经洞中存录了阴嘉政开窟的功德记写本 P.4638 (3)，知阴嘉政窟完工于 839 年，属于蕃据敦煌后期有纪年的代表洞窟；第三，阴家是敦煌的大族，在敦煌边地，高门大族在社会政治生活、石窟营建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吐蕃时期也不例外。因为洞窟信息相对完整，通过实地观察，可以相对准确地获知阴家窟内的题材选择、图像配置、艺术表现等细节，由此建立起读图的基础。因为有《阴处士功德记》文书相比照，可以据此建立起阴氏窟的功能与敦煌家族窟之间普遍联系。因为阴家的大族地位，阴家窟的一切举动都可能在敦煌起到示范作用，形成一时的艺术风气。这样，个案就有了普遍的意义。例如文中所录，阴家窟原有窟额“报恩君亲”，窟内与报恩有关的图像有亡过父母的画像和报恩经变壁画，文书与壁画二者相互得到了印证，建窟的初衷就明确了。按阴家窟的提示，属于同期建报恩窟有文字和图像线索的另有第 144、359、238 窟以及 P.2991 文书提供的“报恩吉祥之窟”。将这些洞窟和文书联系在一起，说明在吐蕃后期，敦煌出现了以“报恩”为主题的造窟风气，阴家窟是其中的代表。自然，解剖阴家窟也就有了知晓一时风气的价值。若分析再进一步，还会

引出吐蕃时期敦煌汉姓家族的身份认同这类更重大的问题。

此书的研究是围绕阴家窟的图像主题进行的，通过对阴家窟东壁亡过父母邈真像、报恩变、维摩变的解读，阐明了阴嘉政开窟的报恩功德行为，以及营建家窟与祭祖的联系。由此将关注点集中在了敦煌吐蕃时期的家窟艺术与望族信仰上。作者讨论的图像既有单体的，也有通壁的，但都因洞窟的主题而相关联，存在或隐或显的逻辑关系。透过这样的观察，作者的目的在于表达一个认识：当初功德主对洞窟的营建、图像的布陈是经过了一番苦心设计的。因此，洞窟中的壁画和龕像在今天看起来仍然逻辑井然，可见作者在阴家窟上的用功是有成效的。读懂了图像，就能把握住主题，更多层次的问题也自然在清晰的逻辑线索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叙事语境。

敦煌吐蕃时期开凿和补绘的洞窟约有八十多个，阴家窟仅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个，尽管作者讨论的不少问题带有普遍性，但还不是蕃据敦煌时期石窟艺术的全部。就整体研究而言，王中旭的研究是一份有质量的阶段性成果，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接着做下去。是为序。



2011年7月12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吐蕃统治敦煌与莫高窟的营建	(1)
二、莫高窟吐蕃晚期洞窟艺术的变革	(7)
三、阴窟概况与阴氏家族	(10)
四、阴窟的发现与研究	(16)
五、本书研究的内容、角度	(29)
第一章 主室东壁图像与洞窟主题	(34)
第一节 《报恩变》	(34)
一、阴窟《报恩变》的情节和特点	(36)
二、须阇提、善友太子本生故事	(45)
三、鹿母夫人故事	(60)
第二节 《阴嘉政父母供养像》	(66)
一、主室窟门上方的供养人像	(67)
二、持炉胡跪的功德主供养像	(73)
三、持炉胡跪与佛事活动、吐蕃习俗	(78)
四、邈真与窟主父母供养像	(86)
五、家窟与祀祖	(96)
第三节 《维摩变》	(100)
一、阴窟《维摩变》的情节和特点	(100)
二、吐蕃时期赞普及随从像的演进	(105)

三、帝王、赞普问疾的政治内涵	(115)
第四节 主室东壁图像的设计	(122)

第二章 主室西壁龕内壁画与主尊释迦

第一节 《佛本行故事》

一、龕内北壁东扇	(125)
二、龕内北壁中扇	(137)
三、龕内北壁西扇	(138)
四、龕内西壁北起第一扇	(143)
五、龕内西壁北起第二扇	(146)

第二节 《本生故事》

一、《转轮王本生》	(147)
二、《萨埵那太子本生》	(150)
三、《善友太子本生》	(152)

第三节 《瑞像图》

一、盪顶西披	(163)
二、盪顶东披	(170)
三、盪顶南披	(179)
四、盪顶北披	(188)
五、屏风式《瑞像图》的特点	(190)
六、阴窟《瑞像图》的相关问题与瑞像信仰	(195)

第四节 主室西壁龕内图像的设计

第三章 主室西壁《文殊、普贤并侍从图》与相关化现、行愿图

第一节 《文殊、普贤并侍从图》的新样式与侍从

名称的考证

一、阴窟《文殊、普贤并侍从图》的新样式	(207)
二、文殊、普贤侍从之一：菩萨天女与昆仑奴	(212)

三、文殊、普贤侍从之二：天龙八部等护法神	(215)
四、文殊、普贤侍从之三：帝释天和大梵天	(223)
第二节 《文殊、普贤并侍从图》的形成与法华、 华严信仰	(232)
一、骑象普贤像的出现与法华信仰	(232)
二、骑狮文殊、骑象普贤像的对应与法华信仰	(237)
三、《文殊、普贤并侍从图》的形成与华严信仰	(242)
第三节 吐蕃时期的《五台山化现图》与五台山 信仰	(245)
一、吐蕃时期的《五台山化现图》	(246)
二、唐《五台山图》《五台山化现图》和《五台山 十寺脉络图》	(252)
三、五台山信仰与护国思想	(260)
第四节 吐蕃时期的《普贤行愿图》《普贤并万菩萨化 现图》与相关问题	(267)
一、《普贤行愿图》和《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268)
二、《普贤并万菩萨化现图》与五台山信仰	(273)
三、普贤像与相关佛事	(278)
第五节 主室西壁龕外图像的设计	(284)
 第四章 主室南、北壁经变的流行和对应	(287)
第一节 屏风式	(288)
一、经变的构图：从中堂式到屏风式	(289)
二、龕内屏风的过渡	(292)
三、屏风的普及及其对墓葬空间装饰的影响	(297)
第二节 吐蕃时期经变对应的现象	(306)
一、前贤的研究	(306)
二、经变对应关系、方位的统计	(309)

第三节 往生净土：《西方变》与《药师变》的流行和对应	(317)
一、阴窟《西方变》《药师变》的特点及对应的现象	(317)
二、《西方变》《药师变》的流行与佛教宗派	(323)
三、西方净土信仰与丧葬礼俗	(326)
四、药师信仰与荐亡	(333)
第四节 生天：《弥勒变》与《天请问变》的流行和对应	(337)
一、《天请问变》上部的天宫	(339)
二、《天请问经》与荐亡修福	(345)
三、生天	(349)
第五节 《法华变》与《华严变》的流行和对应	(354)
一、阴窟《法华变》的特点	(354)
二、阴窟《华严变》的特点和图本来源	(359)
三、《法华变》与《华严变》对应的原因	(362)
四、荐亡与往生	(367)
第六节 主室南、北壁图像的设计	(375)
第五章 洞窟图像与佛事	(378)
第一节 吐蕃时期佛事的盛行	(379)
一、洪誓与佛事	(379)
二、吐蕃统治者与佛事	(381)
三、与民众生活有关的佛事	(385)
第二节 家窟与佛事道场	(387)
一、家窟与佛事	(388)
二、洞窟空间与佛事道场	(390)
第三节 经变与佛事	(392)
一、《西方变》与西方净土行仪	(393)

二、《弥勒变》与弥勒上生行仪	(403)
三、《法华变》《华严变》与相关佛事	(406)
第四节 阴窟图像与佛事	(410)
结 语	(412)
附录一 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	(416)
附录二 莫高窟吐蕃时期石窟分布区域表	(424)
图版来源	(439)
参考文献	(455)
索 引	(473)
后 记	(485)

绪 论

一、吐蕃统治敦煌与莫高窟的营建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唐朝抽调安西、河西兵力东去防卫京师之机,于广德元年(763年)始陆续攻陷陇右、河西诸州,切断了敦煌与唐王朝之间的联系,至贞元二年(786年),沙州最终陷落^①,敦煌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到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趁吐蕃内乱收复瓜、沙二州,吐蕃统治敦煌前后达六十余年,学界习惯于将这段时期称为“吐蕃统治时期”(或“吐蕃占领、管辖时期”),本书简称为“吐蕃时期”,其时段大体与中唐相对应。

敦煌石窟艺术在唐代前期(包括初、盛唐)达到鼎盛,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最为流行的西壁开龕殿堂窟中,形成了以经变为中心的图像配置方式,经变在所占壁画面积、所要表达的思想中都占有主体地位。这种配置方式始于贞观至龙朔年间开凿的翟通窟

^① 关于沙州陷蕃的时间,说法不一,但主要集中在8世纪80年代。其一为大历十二年(777年),马德主张此说;其二为建中二年(781年),出自《元和郡县志》,支持此说的有徐松、翟理斯、向达、陈祚龙、藤枝晃、史苇湘等;其三为贞元元年(785年),罗振玉倡此说;其四为贞元二年(786年),山口瑞凤、陈国灿主此说;其五为贞元三年(787年),戴密微、饶宗颐、苏莹辉(补订说)等持此说。本书取陈国灿786年说。参见陈国灿:《唐代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载《敦煌学辑刊》,1985(1),1~7页。

(第220窟),对唐代前期石窟的图像配置、思想有着实质性的影响。第二,据敦煌研究院统计,该时期洞窟的数量多达124个,其中就包括莫高窟具标志性的两个大窟——北大像(第96窟)与南大像(第130窟)。第三,在艺术水准上,尤其是线条的表现力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代表作品如盛唐第45窟主室东壁的维摩像,这种强调线条表现力、清淡设色的风格应是受到中原吴道子的影响。

唐代前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兴盛,与敦煌当地的安定、富庶,以及中原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吐蕃的入侵,使这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一方面,敦煌遭到了长达十年的围困,直到贞元二年(786年)才在勿徙他境的条件下寻盟而降,当地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吐蕃是从东往西进攻的,先占领陇右,再相继攻陷凉州、甘州、肃州和瓜州,敦煌和中原的联系被切断。莫高窟存在着一批盛唐开凿、吐蕃时期补绘的洞窟^①,该现象说明,吐蕃的进攻导致当时部分正在营建的洞窟被迫停工。可以推测,自大历十一年(776年)李大宾窟(148窟)完工之后^②,莫高窟的营建活动应基本处于停止状态,当时敦煌不仅没有足够的物力、人力投入到洞窟的营建之中,工匠体系当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以说,吐蕃的入侵使兴盛的莫高窟艺术骤然衰落。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敦煌在军镇体制上属于瓜州,吐蕃统治者设置节儿为敦煌首脑,由吐蕃人担任,将百姓分为若干部落,强迫汉人易服辫发。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维护稳定的措施,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敦煌民众投降时得到了勿徙他境的承诺,

^① 参见沙武田:《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之初探》,载《敦煌研究》,2002(3),14~18页。

^② 贺世哲认为该窟建成不晚于大历六年(771年),但此推论是立足于吐蕃建中二年(781年)占领沙州的基础上的,现在学界多认同陈国灿的观点,认为吐蕃占领敦煌是在786年。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该窟功德记的记载应更为可信。参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20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从现有敦煌文献^①来看,该承诺基本得到落实,也就是说,敦煌本地的民众成分没有大的改变;第二,敦煌望族豪强的财产基本得到保护,吐蕃统治者吸纳了大量的当地人进入官僚体系,依靠当地的望族豪强实行统治^②;第三,佛教得到保护并得以迅速发展,僧人在协调汉、蕃矛盾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上述三点是吐蕃时期莫高窟的营建活动得以恢复、发展的基础。

吐蕃统治之初,汉、蕃关系一度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领导敦煌民众抗蕃的阎朝被暗杀,玉关驿户汜国忠等六人的起义导致节儿自焚。^③ 在一份名为《原籍表》的藏文文献中,有十位僧人被编入曷骨萨部落担任射手。^④ 在这样的条件下,莫高窟不可能有正规洞窟的营建。现在发现最早有吐蕃纪年的是第199窟,该窟开凿于盛唐,吐蕃时期索崇嗣、王辅朝等补绘。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该窟盛唐仅完成窟顶,西壁龕内和龕外南侧、下部,西壁龕外北侧和其余三壁均为吐蕃时期补绘完成的。^⑤ 其中,南壁中间绘观世音、大势至和供养比丘像,比丘像下方有题记曰:“丁丑年四月三日龙兴寺学使郎。”^⑥ 吐蕃时期只有一个丁丑年,即797年,此时吐蕃占领敦煌已经大约十年。

敦煌文献显示,大约在815年至9世纪20年代,敦煌修建佛寺、造像的活动开始恢复。

① 本书所说的“敦煌文献”,除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外,还包括洞窟中保存下来的修窟功德记、供养人题记。

② 参见〔日〕山口瑞凤:《吐蕃统治的敦煌》,见《讲座敦煌2·敦煌的历史》,1~52页,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高然的译文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41~52页。

③ 参见史苇湘:《河西节度使覆灭与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见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137~161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④ 录文参见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40~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⑤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78~7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⑥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9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